

从选举到治理：智能革命视域下的西方政党政治发展^{*}

高奇琦

[内容提要] 西方政党的组织化是在选举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在智能革命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果仅仅将政党的核心功能限定为选举,那么西方政党衰落便是不争的事实。智能革命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人工智能也会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如何保障新失业群体的生活并填充其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会成为重要政治议题。这两个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重新回到政党。政党的治理功能会变得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在应对未来智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式会成为世界性的领先方式。

[关键词] 智能革命 西方选举政治 未来政党发展 政党政治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5.06.018

政党类型划分一直是西方政党理论中的关键问题。^①政党形态会朝向哪些方向发展是其关心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政党类型学领域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关于卡特尔型政党的讨论^②,赫伯特·基茨谢尔特关于运动型政党的分析^③,乔纳森·霍普金和卡泰丽娜·保卢奇关于商业公司型政党的探讨等^④,都是代表性成果。然而,在近20年的时间内,政党的类型学研究并未有太大进展。已有政党研究是在传统政治学以及政党研究的思路下展开的,往往缺少新科技革命的视角。本文将引入这种新视角,即从智能革命的角度来看待政党结构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时结合智能革命的新发展动态对未来西方的选举政治以及政党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做一些研判。

— 130 —

^{*}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塑造和前瞻性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5&ZD277)的前期成果。

- ^① 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从目标与动机、关键资源、主要约束三个维度出发,对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这三种政党类型进行了进一步概括。这为他们提出卡特尔政党这一类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参见 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The Evolu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The Three Faces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4, No. 4, 1993, pp. 593 – 617。
- ^② 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in *Party Politics*, Vol. 1, No. 1, 1995, pp. 5 – 28。
- ^③ Herbert Kitschelt, “Movement Parties”,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278 – 290。
- ^④ Jonathan Hopkin and Caterina Paolucci, “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sation: Cases from Spain and Ital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5, No. 3, 1999, pp. 307 – 339。

一、西方政党的组织化与选举政治

西方政党的组织化与选举政治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现代意义的政党最早出现在英国。从类型学上来看,精英型政党是最早出现的政党类型。莫里斯·迪维尔热指出:“在19世纪普遍存在的、基于财产资格的选举制度下,政党显然呈现出精英型政党的形态:在民众尚无政治影响力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将大众吸纳为党员。”^①精英型政党的典型案例是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出现的议会内部的政治派别,如辉格党和托利党。^②其中,辉格党主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托利党则更多代表传统地主贵族的利益。^③精英型政党的典型特征是它们仅仅是议会中的派别联盟,与社会结构的关联非常有限。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西方社会还没有开放大规模选举。

群众型政党是在前两次工业革命和选举结构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次工业革命与选举结构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在英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英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工业资产阶级主张自由贸易,逐渐在原来辉格党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自由党;以土地贵族为核心的传统势力则反对逐渐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在原来托利党的基础之上组成了保守党。^④1832年,英国议会进行了选举改革,并扩大了普选权。^⑤普选权的扩大与英国工人运动的斗争密切相关,而英国工人运动恰恰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自然结果。在工业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工人的数量大为增加,但在政治上却缺乏足够的表达和代表,所以就通过工人运动来表达诉求。普选权扩大有助于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筹码。当然,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力量还非常微弱,政治变化更多反映的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诉求。1832年的议会改革进行了议席分配的调整,将更多议席分配给了新兴工业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新兴工业阶级获得议会席位的可能性。^⑥同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也在这次改革中获得了选举权。恩格斯对此指出,此次改革“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⑦。

简言之,这次改革的不足之处在于,广大的工人阶级以及女性仍然被排斥在选举过程之外。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英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工人运动的重点内容之一便是要求将普选权进一步扩大至工人。1867年的改革再次调整了议席分配。^⑧这一过程同样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有利,因为新增加的议席可以进一步分给大工业城市,这就使得工业资产阶级可以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议会代表。同时,这次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改革是第三次重要改革。这次改革将房屋所有者的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其他郡区,特别是使农村地区的选举资格增加,最终使得英国的选民人数达到450万人。1885年议会通过关于分配议席的新法案,重新调整后的选区更倾向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这一点实际是为了回应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在1918年的英国议会改革中,年满30岁的女性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议会改革则进一步将女性选举权的年龄调低为21岁。^⑨在这两次议会改革后,女性工人也开始参与进选举系统之中。

最早和最深入地推动政党组织化的是左翼政党。这种组织化可以被看成是左翼政党对工人运动的一种体制性吸纳。在工党兴起之前,保守党

①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p. 65.

② 参见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③ Stephen Ingle,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6.

④ Robert Self,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1885 - 1940*, Harlow: Longman, 2000, pp. 41 - 44, pp. 55 - 61.

⑤ Frank O'Gorman,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Two - Party System, 1760 - 1832*, London: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y, 1982, pp. 116 - 119.

⑥ Stephen Ingle,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8 - 13.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880页。

⑧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⑨ 参见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40页。

和自由党已经在 19 世纪形成了轮流执政的格局。然而,这个时期,英国的议会改革制度才逐步铺开。例如,到 1867 年时,英国的选民人数才 200 多万,而英国此时的总人口大概在 2500 万人。换言之,这时候的选举还主要是一种精英行为。政党仍然是一种精英型政党的典型形态,但已经开始发展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开始出现群众型政党的一些雏形。真正进行较深层次政党组织化的是左翼政党。英国工党的历史可以溯源至 1900 年成立的职工大会。1906 年改称工党。^① 换言之,工党一开始就是在工人运动及其组织上建立的。工党对个人党员的吸纳和接收体现了其组织化程度的加深。在 1918 年之前,工党只接收集体党员。1918 年,西德尼·韦伯推动改革,除保留集体党员制度之外,在各选区增设组织以吸收个人党员。^② 此项改革使得工党从一个更多依附于自由党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具有高独立性的政党,并于 1924 年在自由党的支持下首次组阁。^③ 在二战结束之前,工党有两次短期执政。英国工党的政党组织化使其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影响了整个英国政党的组织化进程。

在英国工党之后,保守党逐步推动大规模政党组织化。保守党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是在二战结束初期。尽管保守党也有卡尔登俱乐部等一些外围组织,但更多是一种带有精英色彩的俱乐部,并非基于群众的广泛俱乐部。从卡尔登俱乐部的职能便可看出其具有较强的精英色彩。^④ 相比而言,英国工党的政党组织化程度更高。在议会之外,全国代表大会是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全国执行委员会、区域会议等组织。^⑤ 左翼政党通过工会以及妇女联合会等外围组织,更加容易在社会中形动员,也更早地实现了政党的组织化,通过将大量获得选举权的公民纳入政党组织,形成强大政治力量。

德国在工人运动和左翼政党化上比英国推动得更早。具体而言,德国社民党的成立时间较早,其前身是 1863 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75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 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该组织在 1891 年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⑥ 德国社民党是在工人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社民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多次面临挫

折。例如,早期遭到俾斯麦政府的禁止。尽管遭到镇压,德国社民党还是在工会的支持下,在工人中拥有强大影响。1959 年《哥德斯堡纲领》的提出,标志着其在经济政策和政治原则上都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⑦,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德国社民党的中间化,由原来代表工人阶级逐步转为代表整个社会。1989 年的《柏林宣言》,表明德国社民党的中间化更加明显。

长期在德国政坛上与社民党形成明显竞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前身是 1870 年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主要代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一些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非常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在宗教上希望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利。天主教中央党在信奉天主教的工农群众中有较大影响。根据 1925 年的职业调查,工人占全体就业人员的 45.1%。其中,只有部分工人在选举中会支持德国社民党,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则基本上都支持天主教中央党。^⑧ 天主教中央党的成立和发展看起来更像是对工会运动的一种反应。当工会被整合进社民党时,需要形成一个制衡的力量来制约它。这时候,天主教成为这样一个凝结社会成员的基本力量,这就是天主教中央党成立的背景。该党在 20 世纪初期时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天主教中央党在二战后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是德国在社会主义运动广泛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反应。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西欧国家的社民党等社会主义力量也得到发展。这时,作为一种刺激性的反应,1950

①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7—322 页。

② Ivor Bulmer-Thomas,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Volume 1 (1640 - 1923)*, Suffolk: Richard Clay (The Chaucer Press), 1965, pp. 241 - 242.

③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2 页。

④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8—209 页。

⑤ Stephen Ingle,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83 - 89.

⑥ 参见[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求实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9、43 页。

⑦ 参见[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求实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3、234 页。

⑧ 参见[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求实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2 页。

年基民盟正式成立。基民盟有中央、邦、县、乡镇四级架构。在政党组织之外,有基民盟青年联盟、基社青年联盟等团体。^①基民盟在与社民党的反复竞争中,逐步发展出较为严密的群众型政党的样态。

政党组织化集中体现在群众型政党的发展过程中。左翼政党实现群众型政党的形态,本身就是对工人运动的吸纳。工人运动则是两次工业革命的自然结果。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出现并日益发展,最终在政治结构上体现出来。工人运动的发展对政党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工人阶级所具有的相反倾向(即倾向于集体行动),则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化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②工人运动被左翼政党所吸纳,或者说左翼政党的形成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工人运动在政治层面寻求表达的一种方式。左翼政党在吸纳工人运动之后呈现出强大的发展态势,刺激到右翼政党。右翼政党也进行了组织化的努力,并逐步推动形成了与工人阶级相对垒的传统价值观群体,并将其作为组织化的支撑和来源。当然,右翼政党的组织化程度明显要比左翼政党弱一些。

二、智能革命对西方政党选举功能的冲击

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以上情况都受到明显冲击,主要体现为新科技逐步成为重要动员工具,逐步在选举政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党的选举功能在减弱。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西方各国政党的党员数量都在不断减少。这意味着政党以组织化进行选举动员的方式正在走下坡路。年轻人会更加青睐社会团体,也更加青睐各种新兴技术媒介,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动员方式。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③美国政党一直是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特例。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评论道:“由于底层阶级动员的时机与方式在政党及政党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普遍决定性作用,美国政党的独特发展轨迹由此可得到解释。”^④与欧洲发展出群众型政党不同,美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表现出一种职业选举型政党的特征。莫顿·格罗津斯指出,美国的政党可以“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却无法

制定并通过一项纲领;它只有在全国大选、处理庇护(官职分配)事务以及组织立法工作时,才能(而且并非总是)团结一致”^⑤。美国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选举标签。与欧洲政党相比,其政党组织化的程度本身就不高。很多党员与政党的联系相对松散,甚至政党候选人也可能在选举之前更换其选举标签。在美国政党政治中,较早出现了大规模运用新技术来参与竞选的情况。例如,贝拉克·奥巴马参选时,率先采用网络筹款的方式。^⑥与传统的通过政党组织来进行筹款明显不同,这种网络筹款方式在线上进行,是一种扁平化的动员形式。唐纳德·特朗普参选时,更加广泛地使用了推特等工具。推特是候选人与选民直接沟通的工具,这一点与政党的组织化完全不同。^⑦政党组织化体现出其科层制结构的沟通方式。在以政党组织为中心的选举动员中,选民很难与候选人直接互动。但是,在推特这样的新媒体平台上,候选人似乎可以很便捷地与选民互动。^⑧这种新形式的出现使得基于数字技术的选举动员成为可能,甚至使“如何影响选民的态度”变成一

① Wikipedia,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 http://de.wikipedia.org/wiki/Christlich_Demokratische_Union_Deutschlands/.

②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p. 67.

③ Maria Petrova, Ananya Sen and Pinar Yildirim,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on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67, No. 5, 2021, pp. 2997 – 3021.

④ Angelo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Preface, xv – xvi.

⑤ Morton Grodzins,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i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3, No. 4, 1960, pp. 974.

⑥ Robert Wicks et 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and Civic Engagement Among Youth During the 2012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8, No. 5, 2014, pp. 628.

⑦ Peter Francia, “Free Media and Twitter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Unconventional Campaign of Donald Trump”, i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 36, No. 4, 2018, pp. 440 – 455.

⑧ Gunn Enli, “Twitter as Arena for the Authentic Outsider: Exploring the Social Media Campaigns of Trump and Clinton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2, No. 1, 2017, pp. 50 – 61.

个新的技术领域。剑桥分析事件^①就很明显地反映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利用大数据技术有意地调动选民的相关态度,从而为获得选举胜利提供基础。^②这与传统的政党组织化动员完全不同。

在欧洲政治中也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例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在政党类型学中被归为商业公司型政党。^③这种政党在参与竞选时所运用的更多是一种职业化的公司型力量。贝卢斯科尼是媒体大亨,非常善于运用媒体技术影响选民态度,他在竞选中所依靠的不是传统政党组织,而是一个类似于美国选举政治常见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虽然这样的团队规模不大,但是辅之以强大的媒体工具,却可以非常有效地影响选举结果。换言之,之前需要依靠政党组织才能够有效获得选票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如近年来出现的元宇宙和大模型等技术,数字世界进一步成为青年人愿意进入的世界。年轻人更愿意用虚拟化手段参与政治,对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则相对冷漠。^④这迫使政党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更多采取基于新技术的新型动员方式。整体来看,相应变化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如前所述,正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分化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才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出现了左翼和右翼这两大政党来代表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党结构变化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智能革命中,人工智能技术有非常强的替代效应。根据 OpenAI 之前发布的研究报告,程序员、作家、量化金融分析师、设计师等职业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这些职业都是社会上受尊敬度较高的白领职业。^⑤问题是,这些替代效应是否会通过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创造性效应来补充?换言之,新技术革命是否会创造更多新的岗位来填补之前被替代的岗位?这一点从目前的观察来看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的非正式就业群体,这将使阶级情况发生变化。

第二,政党组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之前典型的政党组织结构体现为科层制结构。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正是以德国社民党为原型来完

成的。^⑥然而,许多文献已经讨论到美国政党可能就是欧洲政党发展的下一个目标。欧洲政党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趋势。^⑦这种美国化体现为政党组织正在变得日益扁平化和松散化。智能技术促进了候选人与选民的直接沟通,从而加深了这种趋势。正式参与者不断减少,同时年轻人更加愿意参加社会团体。以缴党费为方式的正式政党参与,在西方的年轻人中越来越不流行,这一趋势正迫使政党组织进行结构化的调整。

第三,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两种新趋势。一是极化。极化可以被看成是近年来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特征。^⑧极化首先源自选民的态度。大

① 剑桥分析事件指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前,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不当获取数百万 Facebook 用户个人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心理画像并精准投放政治广告,从而操纵选民行为的丑闻。参见 Allison J. Brown,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Leave?’: Exploring (Dis) Continued Facebook Use After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 in *Social Media+ Society*, Vol. 6, No. 1, 2020, pp. 1–8.

② Philip Howard, Samuel Woolley and Ryan Calo, “Algorithms, Bot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S 2016 Election: The Challenge of Automa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or Electio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i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Vol. 15, No. 2, 2018, pp. 81–93.

③ Jonathan Hopkin and Caterina Paolucci, “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sation: Cases from Spain and Ital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5, No. 3, 1999, pp. 307–339.

④ Shelley Boulianne and Yannis Theocharis, “Young People, Digital Media and Engagement: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 38, No. 2, 2020, pp. 111–127.

⑤ Tyna Eloundou, Sam Manning, Pamela Mishkin and Daniel Rock, “GPTs are GPTs: An Early Look at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Potential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https://arxiv.org/pdf/2303.10130>.

⑥ 参见[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5—358 页。

⑦ Richard Katz, “Special Issue 2019: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Becoming More Similar?”, in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Vol. 29, No. 4, 2019, pp. 427–447; Rossana Sampugnaro and Francesca Montemagno, “In Search of the Americanization: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in European General Election”,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Vol. 20, No. 1, 2021, pp. 34–49.

⑧ Geoffrey Layman, Thomas Carsey and Juliana Horowitz, “Party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2006, pp. 83–110.

多数主要政党(特别是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希望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靠近,这就使得选民以一种反叛者的姿态更加青睐极化观念。在新智能技术基础上,结合社交媒体的强大传播效应,观点容易被放大,导致政党意识形态倾向于采取更极化的表达方式,长期来看可能加剧意识形态的极化趋势。二是议题投票。选民可能更加在乎政党在一些议题上的态度与自身的偏好是否相近,而不关注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是否一致和连贯。在之前的选举过程中,政党往往会集中于某几个议题。而在智能技术运用于选举后,政党的议题则往往围绕热点展开。在社交媒体与智能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热点日益由议题驱动。即便在智能技术普及之前,议题化已初现趋势,但在当前技术赋能的环境中,议题化成为常态。这使得政党不得不逐渐放弃传统上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坚持,转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对热点议题的回应与表达。

三、从选举到治理:政党功能的结构性调整

随着新技术的兴起,如果仅仅从选举绩效来看,政党组织作为选举的动员性工具似乎在不断失效。一些改革意识较强的西方政党会更加强调这种变化。美国是西方政党发展的例外主义案例。美国政党本身就与欧洲政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与欧洲政党所形成的群众型政党这样的严密组织形态不同,美国的政党一直是以选举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党往往会更快地运用新的数字技术来进行选举动员。就选举结果而言,并不是政党组织而是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决定选举结果。如果这一点长期发展的话,会对政党组织形成较大冲击。就选举的绩效而言,政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在不断下降,这一点在欧洲的政党政治中也已经出现端倪。^①年轻的选民们似乎对政党的组织化动员方式越来越冷淡。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仅仅将政党的功能限于选举,那么政党衰落就是不争的事实。

在西方近年关于政党的讨论中,政党衰落成为一个重要话题^②,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基础理论文献仍然将政党的核心功能定义为选举。政党几乎是与选举政治同步发展起来的,选举便成为西方政党的核心功能之一。但是,在新

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这一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对政党的功能进行理论上的调整。

智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新的革命。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于,可能会让数量较多的人口变成无事者,也就是人工智能会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出现较强的贫富分化。那些熟练运用新技术的人会在新的财富大洗牌中获得优势地位,而那些不能运用技术的人则会沦落到被剥夺的地位。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大转型时代,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发生利益重组和财富再次分配。按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节奏来看,其产生的替代效应是非常强的。

这产生了两大类问题。第一,如何保障这些新失业群体的生活?第二,如何填充这些新失业群体获得的大量的自由时间?前一类问题涉及社会保障。如果一国有非常严密的社会保障制度,前一类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这一点也恰恰是山姆·奥特曼推动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个基本原因。^③未来,失业人口需要有最基本的生活收入。否则,很可能导致社会陷入巨大的冲突和混乱。第二类问题则更加困难。人类个体在之前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是围绕着生存来进行意义的设计。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工作就似乎变成了每个个体行为的中心。例如,学习是以职业规划为中心的。然而,一旦这种全面性失业出现之后,人们应该如何构建意义世界?

这两大类问题特别是第二类问题都不太容易解决。第一类问题可以通过再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第二类问题的解决为政党组织发挥作用留下巨大空间。当然,公民个体出于自己的兴趣可能会加入各种社团。然而,社团却无法替代政党的治理功能,因为社团是碎片化的。不同

^① Ingrid Biezen, 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 "Going, Going, ... Gone? 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1, No. 1, 2012, pp. 24 - 56.

^② Paul Whiteley, "Is the Party Over? The Decline of Party Activism and Membership Across the Democratic World", in *Party Politics*, Vol. 17, No. 1, 2011, pp. 21 - 44.

^③ Sam Altman, "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 <https://moore.samaltman.com>.

兴趣或者不同类别的社团有可能会形成一些联合,但仍然是碎片化的,因为它是基于不同的兴趣或者类别而产生的。在大转型的过程中,共识的形成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样的共识需要依赖政党来形成。因此,政党组织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就其英文的字面含义来讲,政党既代表部分,也代表整体,这一点乔万尼·萨托利有深入的讨论。他指出,在词源上,政党(part party)“源自拉丁语,来自动词 partire(分割)……‘part’进入法语成为 partager(意为‘分享’),进入英语成为‘partaking’(参与,更不用说‘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参与’(participation))”^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伴随着智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仅仅将政党的功能定义为选举,那么它自然会面临衰落。但是,如果将政党的功能定义为治理,那么政党应该会有更大发展。社会在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完全通过国家手段来解决。或者说,这里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国家的功能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沿性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是由社会当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在社会治理的一些困难环节中,这些先进分子会发挥重要的模范作用。同时,在面临一些集体困难时,党可以有效地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以共同解决困难。这恰恰是在智能革命产生的巨大转型过程中极为需要的。一方面,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需要重新进行财富再分配,那么政党的功能会与国家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当然,进行财富分配主要是通过国家的手段和方式。另一方面,当个体的精神世界面临一些挑战时,政党就可以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机制和功能。当然,政党需要同其他的社会组织一起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在政党之外,往往会有大量的外围组织,而政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这些外围组织的意愿和想法进一步集聚在一起,形成相对统一的政党意识形态。

四、西方群众型政党的全方位化和卡特化

全方位型政党实际上是在群众型政党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对特定阶级或群体的依赖,转向寻求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群众型政党的

基础是阶级对垒,因此它一方面会形成严密的组织,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也往往会处于两端。例如,左翼政党就形成了强调分配和工人阶级利益的鲜明意识形态。全方位型政党则代表了某种中间化。奥托·基希海默尔认为,全方位型政党放弃了对群众进行思想和道德约束的尝试,转而更全面地聚焦选举领域,试图用深度影响力换取更广泛的受众和更直接的选举胜利。在选举中,全方位型政党高度聚焦那些几乎不会在社会中遭遇反对的议题。^②这种政党出于获得选举胜利的策略考虑,可以在中间选民定理中得到明显验证。^③换言之,那些希望长期执政的政党在长期参与选举竞争的过程中,会逐步将意识形态向中间靠近,以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年来西方社会出现的意识形态极化现象。极化趋势恰恰是对中间化的一种反抗。当政党中间化之后,选民会发现,无论投哪个政党,其政策都是类似的。因此,选民会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考虑而倾向于极化观点。一些在选举结构中冒出来的新政党,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且希望抓住这种选民的新动向。在一些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中,这种极化思维会更加明显。然而,当接近执政目标之后,这些政党往往会中间化。中间化实际上是长期执政的要求。并且,信息革命的发展也会影响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对垒的情况主要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在进入信息革命之后,这一点已经在发生较大的变化。

卡特型政党是在全方位型政党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卡特型政党通常体现为政党的长期执政。^④这里的长期执政往往表现为政党联盟(组成联盟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可能存在冲突)的大政府形态。这一点在德国政治中表现得极为明

^①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05, p. 4.

^②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 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77 - 200.

^③ 参见[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26页。

^④ 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The Cartel Party Thesis: A Restatement”,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4, 2009, pp. 753 - 766.

显。例如,社民党和基民盟分别是左翼和右翼政党,但是在各自选票不够的背景下,两党会选择通过联合组成大联合政府^①,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卡特尔政党化。如果这样的大联合政府长期存续,会使左右翼政党都拥有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当然,卡特尔型政党在西方的政党政治中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无论是全方位型政党还是卡特尔型政党,实际上都指向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即西方学者所强调的政党轮替的意义在不断下降。未来社会可能会出现少数人工作而大多数人无所事事的情况。多数人无所事事,实际上是对政治秩序的一个巨大挑战。对政治而言,最关键的任务是要保障没有正式工作同时有大量自由时间的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合理分配其突然增加的大量自由时间,并协调其与工作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这样的社会结构来看,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可能恰恰是未来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西方政党不仅需要向治理型的政党转变,而且有必要朝向长期执政的目标。只有长期执政,才能够让绝大多数无工作群体的基本利益得到保障,同时政党组

织和相关社团所提供的丰富组织生活也有助于将一个碎片化社会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注重社会治理的实践会成为一种先行形态。在应对未来智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同样会成为一种领先的方式。换言之,在面对未来智能革命的巨大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的精准扶贫、共同富裕等都会成为应对智能革命巨大风险核心理念^②,这些理念有助于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靳呈伟]

① Thomas Saalfeld, “Coalition Governance Under Chancellor Merkel’s Grand Coali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Cabinets Merkel I and Merkel II”,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8, No. 3, 2010, pp. 82 – 102.

② 高奇琦、杨宇霄《智能革命与共同富裕: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延伸性思考》,载于《求是学刊》2022年第6期。